

# 吴可读与左宗棠的交谊

文/周奉真

清朝同治光绪年间,甘肃皋兰籍御史吴可读因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的历史机缘,两人缔结了深厚的情谊,宛若寒夜双星,彼此映照。

## 弹奸初识

同治年间,陇右之地生灵涂炭。朝廷特命左宗棠总司平乱,其时部分官员履职不力,尤以乌鲁木齐提督成禄为甚。成禄(1823-?),镶白旗满洲栢连佐领下人,累功至乌鲁木齐提督。自同治四年(1865年)驻兵甘肃高台,七载间虚报兵额、横征暴敛,民怨沸腾。左宗棠决意参劾此人以儆效尤,整顿西北军务。他洞悉成禄虚报军情、欺上瞒下之本质,遂于同治十一年四月三十日上《成禄出关难期振作片》,系统揭露其三大罪状。奏折直指成禄“谬率乖张,实难枚举”,请“简派知兵大员接统该军”。

成禄暴行至权家屯血案达顶点。同治九年(1870年)五月,甘肃高台县权家围庄生员李载宽、赵席珍等因秋粮歉收请愿缓捐,反遭成禄诬为“聚众谋逆”。左宗棠调查证实,成禄以“抗粮”为名发兵围庄,“主客士民及老幼妇女二百余人概行屠戮”,稚子蒙学亦未幸免。更诬以“剿灭叛逆”,奏称“阵亡把总仲瑞林、周得胜等应请议恤”邀功。左宗棠愤而上《武职大员苛敛捐输诬民为逆纵兵攻虚请旨查办折》,痛陈:“此实稍有人心者所不忍为,亦军兴以来所仅见。臣既察讯得实,若壅于上闻,何颜立于人世!”

御史吴可读继起上奏弹劾。吴氏早于同治九年夏便听闻有关成禄行为的传闻,然因“事关重大”暂未公开举发,而是暗中联络甘肃地方人士查证。待见到朝廷明发左宗棠奏折后,随即呈上《陈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罪状疏》,列举其任陕西提督雷正绾部属时,因庖厨煮面不熟竟斩首泄愤等罪状。吴可读更以“臣乡百姓莫非朝廷赤子”为引,痛陈当地民众“初遭战乱,继受匪患,复遇兵灾,今又遭官员荼毒”。奏劾指“成禄有可斩之罪十,不可缓之势五”,措辞严正,凛然生威。朝廷援引《大清律例》,拟对成禄处以斩立决。然成禄系满洲贵族,竟得翻案。朝廷曲意回护,改斩立决为斩监候。吴可读愤而上《请诛已革提督成禄疏》,言辞激烈:“想见古人忠君爱国、奋不顾身家之义,臣亦愿效此愚忱,奏请皇上先斩成禄之头,悬之藁街,以谢甘肃百姓。然后再斩臣头,悬之成氏之门,以谢成禄。”少年同治,初登帝位,敏感异常,认定吴可读欺他年少,才敢语带嘲讽,如此放肆。据黄濬《花随人圣庵忆》记载:同治帝

“大怒,谓‘吴可读欺负我’,大哭,非要吴脑袋不可,原旨斩立决”。三法司会审,刑部希承上意,拟定吴可读死罪。清律规定,定人死罪,须“刑部、都察院、大理寺十三堂官皆画诺,独家壁不肯,柳堂因此改流(放)”。惟因大理寺少卿王家璧持正不阿,吴可读性命得保,御史职被撤,降三级调用。成禄则仍判“斩监候”,囚于狱中。左宗棠虽与吴可读素昧平生,但在此事上展现了整肃纲纪的共同担当。左氏借此契机理顺西北军务,为后续经略奠基。念及此谊,左氏对吴可读青眼有加,成为终生挚友。在吴可读遭贬后,左氏感念其风骨,多方斡旋,力邀其回归故里,主讲兰山书院,以续士人经世济民之志。

## 同建贡院

自清康熙五年(1666年)陕甘分治设立甘肃行省,陇原士子须赴陕西参加乡试。左宗棠曾痛陈:“陇土寒苦者多赴陕乡试,远者数千里……故士人终身不预秋赋者,尝十之七八。”道尽边陲学子跋涉之艰。及至左氏平定关陇后,正式奏请陕甘分闱,清廷允准甘肃独立建贡院。此举堪称“普天同庆”,然甘肃经十年战乱,财政支绌,建院资金筹措维艰。

同治十二年(1873年)春,吴可读闯关跋涉,返故里兰州。是年夏,西征总戎左宗棠移驻兰州行轅。二人虽因参劾成禄早闻其名,此番方得初见。左氏邀吴可读主讲兰山书院,同时请其以个人威望向甘肃各界募资建设甘肃贡院。吴可读对陕甘分闱期盼已久,感念机遇,毅然担此重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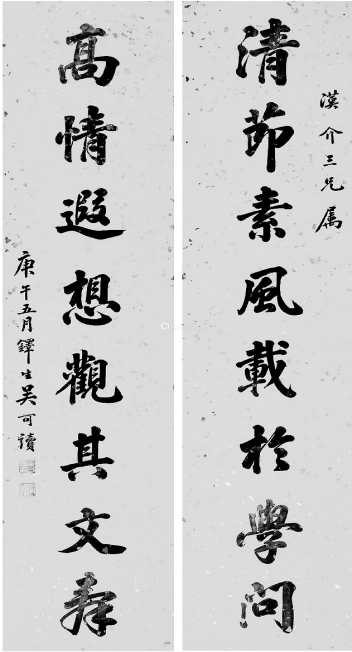
据安维峻《甘肃新通志》记载,吴可读“穿梭于各州县衙门之间,托钵于富绅商贾之门,劝捐到白银五十一万两”。这简略而程式化的记述背后,实为惊心动魄的系统工程。吴可读需在既无专项拨款又无强制手段的情况下,凭一己之力完成巨资募集,其难度远超寻常公务。

吴可读《除夕有怀萃成七律三十首》组诗及其自注,为这段历史留下鲜活注脚。其第十八首“雨雪霏微腊八前”句下自注:“时余奉文劝捐,北川将归。”甘肃腊月平均气温零下八至十二摄氏度,结合“雨雪霏微”之语,可见其冒寒辗转州县的艰辛。诗中“暗数流光惊过客,那堪生计逼残年”之叹,更道出六

旬劝捐者承受的身心煎熬。资金筹集中遭遇的舆论压力,在组诗第一首:“亡羊此夜悲歧路,失马当时说塞翁。”两句后作者自注得到印证:“时余劝捐已就绪,以浮议暂止。”所谓“浮议”,当指地方势力对巨额摊派的非议。吴可读既要应对官场中“各州县衙门”的推诿,又须化解民间“富绅商贾”的抵触,这种双重压力在其“亡羊此夜悲歧路”的比喻中显露无遗。从时间维度考察,吴可读的劝捐工作始于同治十三年春,持续至岁末。其组诗第二十九首“三百六句此夜终”显示,除夕仍在核算账目。

光绪元年(1875年)贡院落成,当年应试者逾三千人,较分闱前增长六倍,印证了这项工程的实际效益。左宗棠在《奏请甘肃分闱疏》中强调“人文蔚起,边疆永固”,吴可读的实践为此提供了物质基础。

在兰州城西北隅(今兰州大学第二医院院址),甘肃贡院于光绪元年秋闱前建成,此年甘肃首次独立乡试如期举行,应试者逾三千之众。贡院落成显著提升本土士绅规模。张仲礼在《中国士绅——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》中的统计显示:康熙至同治朝150年间甘肃进士233人,而光绪朝13科即取士115人,占总数348人的33%。左



吴可读书法作品

氏家书载“兰山书院肄业者四五百人,各郡县闻风兴起”,印证“奏请分闱,添学政,益广文教”之效。自此,皋兰人文蔚起,西北边疆深度融入帝国文化体系,开启“文教敷施”的新纪元。

## 道义之交

吴可读与左宗棠之交谊,实根植于士大夫精神血脉的共鸣。在国是抉择层面,二人展现出超越时代的政治远见。同治十一年(1872年)十月,当同治帝大婚典礼与各国使臣觐见礼仪之争同时爆发时,吴可读上《请令各国使臣觐见不必跪拜疏》,直言“若因争此一节致启衅端,所关匪细”,既援《周礼》“以时制礼”古训,又引康熙朝俄国使臣免跪旧例,力主“礼以时为大”。远在西北的左宗棠亦在奏折中疾呼:“礼以时为大,拘泥虚文而损国体,非智也”,更于私函中痛陈:“今之持华夷大防者,犹抱宋儒腐论,不知英吉利之坚船利炮已抵津门。”两份相隔几千里而呼应的奏疏,以“因时变礼”的务实主张打破华夷之见桎梏,最终促成清廷于光绪元年(1875年)六月十四日下诏准行鞠躬礼。这种政治默契更延伸至边疆治理:当左宗棠弹劾成禄虐政时,尚未见左氏其人的吴可读冒死上疏,以“可斩之罪十,不可缓之势五”相呼应。二人在此事上道义相济,更显士人风骨。吴可读因弹劾成禄获罪革职,陷入“长安居大不易”的困境。左宗棠三度致书邀吴可读主讲兰山书院,考虑他旅费无著,彼此从未谋面,吴又不好开口,便安排友人谢维藩作为中间人代送川资:“如(吴可读)起程盘川无出,李筱轩处弟尚有寄存银一二百金,当可代为筹算。”持久的经济援助更见左宗棠用心之深。吴氏尸谏殉道,据左宗棠家书中记载,他连续三年资助吴家:光绪五年——“以二百两为柳堂营葬”;光绪六年——“吴柳堂瞻家银千余两”;光绪七年——“吴柳堂世兄之恒处,弟曾划廉余千二百金界之。”这种持续性资助超越寻常官僚体面,实为士大夫“朋友有通财之义”的典范。

知音互赏,使二人精神世界高度契合。左宗棠评吴可读“骨鲠可风,意见微偏”,看似批评实则激赏:在晚清官场乡愿之风盛行时,吴氏的“偏”恰是士大夫风骨的棱角。吴可读



左宗棠书法作品

《呈左爵相七律二首》中有“感恩知己更何人,六十年余戴德身”句,视左宗棠为终生知己。将左氏比作“军中韩范名儒度”,更以“三百年来第一人”相许。此誉与左宗棠自诩“今亮”形成精神对话。光绪元年(1875年),吴可读为左宗棠作寿联:“千古文章功参麟笔;两朝开济庆洽牺爿”,上联取孔子作《春秋》之喻,下联化杜甫咏诸葛诗意,既契左氏“文章西汉两司马”的自诩,更暗含对其“东戡闻越,西定回疆”功业的期许。当左宗棠将此联悬于中堂,叹“柳堂知我”时,道义之交已升华为精神知己。面对吴氏以身殉道的刚烈,左氏既批评其对待同治帝“属入感恩图报之私”,又赞其“为正义而死者”的凛然气节,这种理性与感性的交织,恰是传统士大夫精神的完整呈现:既有“杀身成仁”的道义担当,亦存“发乎情止乎礼”的理性自持。

吴左之交,映照出晚清士大夫群体的精神光谱。在传统秩序崩解之际,他们以道义相砥砺,以国事相切磋,构建起超越利害的精神共同体。这种交谊不以权势为纽带,不因生死而断绝,恰如司马迁所言:“士为知己者死”,在晚清的天幕上划出一道璀璨的精神光芒。

【本文为甘肃省2023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《吴可读文集整理与研究》(2023YB129)阶段性成果】

## 明清甘肃古书院



甘肃贡院核心建筑“至公堂”旧貌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

自明清以来,甘肃这片大地上曾遍布着一座座书院。它们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学府,更是维系西北文脉不坠、教化边地、培养士人的精神灯塔,在厚重的黄土地上,书写了一段文明传奇。

甘肃书院的兴起,与明清两代“治国以教化为先”的国策紧密相连。其发展轨迹,清晰地折射出中央王朝经略西北、文教敷施的深远意图。

明代是甘肃书院的肇始期。最著名的代表,莫过于由肃王府主导创建的甘泉书院(位于兰州)。肃王府作为明朝特派驻甘肃的最高统治机构,其兴办书院的行为,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,标志着儒学教育在边疆地区的“官方正朔”地位得以确

立。此外,如河西书院(凉州)、仰止书院(巩昌)等也相继建立,它们多位于府县治所,格局严谨,以讲授程朱理学为主,为甘肃培养了最早一批的本土科举人才,使儒学文明的光芒持续照耀在河西走廊与陇中大地。

清代,尤其是乾隆之后,至同治、光绪年间,甘肃书院进入鼎盛时期。一方面,朝廷鼓励兴办书院,另一方面,在左宗棠等西北重臣的直接推动下,书院建设达到高潮。其中,兰山书院的崛起最具标志性。它由官方创办,被定位为“全省文教之枢”,是甘肃最高学府,全省优秀士子荟萃于此,其山长(院长)多为博学大儒,如清代著名学者吴镇、张澍等都曾在此执掌教鞭。与此同时,各地州县书院如雨后春笋,形成了兰

山书院——府级书院——县级书院的三级教育体系,使文教之风自上而下,深入边地。在众多书院中,有几所尤为突出,它们特色鲜明,共同构成了甘肃书院的璀璨星空:

### 1. 兰山书院

位于甘肃兰州,是甘肃的“省会书院”,地位无出其右。其生徒来自全省,享受官费津贴(膏火银),竞争极为激烈。教学内容以科举所需的八股文、试帖诗为主,兼及经史词章。左宗棠督甘时,对其极为重视,增拨经费,遴选名师,使其成为西北人才荟萃之地。

### 2. 求古书院

位于甘肃兰州,其创办意在弥补兰山书院偏重科举的不足。取名“求古”,意在“考究经史,溯本追源”。书院不设科举课程,专攻经史实学,生徒是已具相当功底的秀才。它与兰山书院一重科举、一重学术,相辅相成,满足了不同层次士子的需求,体现了清代书院教育的精细化分工。

### 3. 五泉书院

作为兰州府级的代表性书院,它承上启下,为府属各州县培养生员(秀才),是士子通往兰山书院的必经阶梯。其规模虽不及兰山书院,但制度完备,管理严格,是地方教育体系中的坚实一环。

### 4. 柳湖书院

位于平凉城北的柳湖公园内,其地

风景佳胜,泉水潺潺。左宗棠在督师西征、驻节平凉期间,见此地人文荟萃但学舍简陋,遂捐出养廉银,下令重修柳湖书院,并亲书“柳湖”匾额。他增建学舍,募集书籍,并亲自为学子制定课程,倡导“读书当为经世之学”的务实风气。经此一番振兴,柳湖书院声名大振,不仅成为平凉的文化地标,更成为左宗棠在西北推行“教化”政策的一个缩影。

### 5. 陇南书院

位于甘肃天水。依托天水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,陇南书院学风扎实,经史并重。陇南书院的山长(院长)多由学问博洽、品行端方的硕儒担任。书院培养的人才,不仅服务于地方,更走向全国,成为维系陇右文化与中原文明血脉相连的重要纽带。直至清末新政,陇南书院亦顺应时势,改制为新式学堂,但其数百年积淀的学术传统与精神遗产,已深深融入天水的城市文脉之中,至今仍在滋养着这片古老的土地。

### 6. 阿阳书院

在陇中地区的静宁县(今平凉市静宁县),阿阳书院是清代地方教育体系中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存在。其名“阿阳”,源自静宁的古地名,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。该书院由时任静宁知州主持创建,是典型的官办州县书院,其主要职能是为本州生童提供科举预备教育,并教化乡里。

这些书院的生命力,藏在独特的制度设计与教育理念中。建筑上,它们多遵循“讲学、藏书、祭祀”三位一体格局,柳湖书院的石桥牌坊、凤鸣书院的讲堂厢房,皆将人文建筑与自然景观相融,成就“天人合一”的育人环境。管理上,“官办为主、绅助为辅”是普遍模式,官员捐俸、士绅输财与学田租税共同构成经费支柱,确保教育绵延不绝。教学中,既重科举应试的八股文与试帖诗,也倡“经世致用”,舆地、算学、农书研究等实用之学并行,每月三次课试的严格考核与“膏火银”奖励机制,激励着学子勤学不辍。更可贵的,是书院常以楹联明志,“立异日功名,全在平时学问”的箴言,将修身与向学的理念深植人心。

至晚清光绪年间,“戊戌变法”后清廷推行新政,诏令所有书院改为新式学堂。甘肃的兰山书院改为甘肃高等学堂,求古书院清末改制后,最初改为“甘肃高等学堂预备科”,后因新政军事教育需求,调整为甘肃陆军小学堂,五泉书院改为兰州府中学堂。至此,书院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,但其精神血脉,已悄然注入甘肃近代教育的肌体之中,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文明接力。

回望明清甘肃古书院,它们不只是冰冷的古建筑,而是数百年间无数陇人学子求知、思索与精神寄托的所在。在苍茫的西北大地上,这些院落里传出的琅琅书声,曾是这片土地上一道最深沉、最富希望的人文风景。它们所承载的兴学重教、经世致用的精神,至今仍是陇原文化基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提醒着我们:文脉的传承,是文明得以生生不息的真正力量。

(本版编辑综合整理)